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高帆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早在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为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就经济学领域而言，10年来，我国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呈现出新气象新特征。在此背景下，梳理其构建历程和研判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其基本功能是解释世界、改造世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同时，在经济领域创造多个维度的发展成就，如，城镇化快速发展、实现大规模减贫、制造业跨越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蕴含着鲜明的创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国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需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这要求自主构建契合本土特征和发展实际的创新经济理论，在洞察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有效制度安排、政策举措。这意味着，无论是解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还是推进后续发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都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具备条件并迈出坚实步伐

经济学是对经济实践的经验提炼、规律认识和理论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的经济实践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从传统计

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跨越。此外，我国拥有数以亿计的微观主体、层次多元的产业形态、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特征的科研群体，为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概括起来，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应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行性认识也更为深入。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立足自身发展特征在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取得众多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学术界对相关理论成果进行研究阐释，如，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注重完善教材体系、推进学科建设、改进话语传播体系、加快人才队伍培养。这意味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升。

实践发展呼唤理论创新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的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创新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推进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但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以及理论创新的体系化学理化要求，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经济学研究而言，现阶段我国经济实践发展快速，而与理论发展相契合的学术供给相对迟缓，理论创新供求之间存在着不匹配不适应问题。对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评判基准研究不足，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有待加强，按照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开展经济学研究仍需深入。

如，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现阶段立足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仍需深入回答若干问题：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制度相比存在哪些异同？锚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等等。深入解析这些问题，本质就是在回答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内在规律和深层密码，进而形成新范式新知识新理论。当前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对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回应仍需增强。改革开放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广泛传播，现阶段一定程度上仍存在以西方经济理论直接解释中国经济实践、以西方经济学范式直接评价中国研究成果的状况，我国需要通过完善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驱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把握好理论建构的关键

当前，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破解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构建”，构建方式取决于也服务于构建目标。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中内生出来的，其在本质上需要服务于强国建设，必须着重把握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坚持立场原则。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出发推进构建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展研究，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二是提炼特征事实。加强跟踪研究、田野调查，从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的主要特征、面临的关键问题出发开展研究工作。如，我国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我国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这些具有高度共识性的特征事实出发来展开研究，不仅能够凝聚理论构建的共识，形成学术研究“最大公约数”，而且能凸显实践导向，更好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形成理论体系。完备的理论体系

通常包括核心概念、主要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强化理论体系建设，在学理化体系化研究方面深下功夫。如，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为此，需要系统阐释这些概念与现有经济学中类似概念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各个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联，系统梳理相关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典型案例，从而形成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闭环。

四是推进交叉融合。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旨在解释和指导经济发展，经济学实践具有独特性、动态性、立体性、复杂性特征，推进经济学知识创新必须注重学科交叉、方法融合。如，我国在实践中形成了区别于已有理论和实践的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阐释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结合起来，其他重要概念，如新质生产力、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现代化人民城市等，也需要在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中进行深入阐释。

五是强化分工协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必须将学者的个体探索和机构的组织引导有机结合起来。鼓励学者在各自学术领域持续深耕，在“点”“线”上形成新观点新认识。同时，瞄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依靠有组织科研进行联合攻关，注重发挥研究机构在学科交叉融合中的作用，通过知识生产的组织方式创新形成知识创新成果，在“面”“体”上形成新的理论和范式。

六是形成激励导向。学者的研究工作不仅与自身兴趣和内在驱动相关，而且与其面临的特定学术生态紧密相关。我国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进一步优化激励方式。在成果认定、论文发表、课题评审、人才选拔、项目培育等研究资源配置中，凸显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贡献度，依靠充分有效的激励制度来推动学者、机构等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贡献力量。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垒台、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将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 and 开放政策优势转化为促进外资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动力，成为我国稳外资工作的重要课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扩大双向投资合作作出部署，提出“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实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扩大本地化生产”。这表明，我国稳外资工作正向着存量、扩增量、提质量转变，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成为“十五五”时期推动外资更深融入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的重要抓手。

韩萌

外资是东道国对接全球资本、技术与产业网络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为东道国引入资本投入，还能够通过技术扩散、产业配套、就业创造与竞争效应等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尤其对于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而言，外资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弥补资金缺口，更多体现为推动产业升级、强化创新能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嵌入深度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境内再投资，是指外资企业将在东道国经营所得利润继续用于当地扩大生产、设立新项目、增资扩股、研发投入或产业链配套建设等，而非全部汇回母国或境外总部。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境内再投资既体现了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市场前景、制度环境和发展潜力的信心，也意味着其从短期经营向长期扎根转变。

为何当前如此重视外资境内再投资？

这是我国应对全球贸易投资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巩固外资基本盘的现实需要。2025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76.9亿元，同比下降9.5%。企业数量增加，而资金规模承压，说明中国市场虽有吸引力，但外资决策更加谨慎。在国际层面，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14%，但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全球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实质性投资扩张偏弱，新设绿地投资项目数量下降16%。这意味着，在全球生产性投资不足、对优质跨境资本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稳外资不能只依赖新增项目引入，更要重视已在华外资企业的存量基础和再投资潜力，使外资企业已经形成的在华经营基础转化为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持续动能。

这是提升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综合贡献的有效途径。外资企业并不仅是资本供给者，也是就业创造、技术扩散、管理升级和国际市场连接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3的进出口、1/4的工业增加值、1/7的税收，创造了3000多万个就业岗位。2014年至2024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因此，鼓励外资企业把在华利润继续用于增资扩产、研发创新和产业链配套，并不是简单把资金“留下来”，而是推动资本、技术、管理、人才和市场渠道等要素继续在中国扎根、扩散和升级。

这是优化外资结构、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关键路径。202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17.7亿元，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5%、42.1%、22.9%。这表明，尽管外资总体实际使用规模有所波动，但高技术、高附加值和新兴服务领域仍具有较强吸引力。引导外资企业将更多在华收益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领域，有助于推动外资更好融入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

这是增强我国开放型经济韧性、提升高水平开放效能的重要支撑。相比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新增投资，已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更加熟悉中国市场、产业配套、制度环境和消费需求，其再投资通常具有决策链条更短、项目落地更快、产业嵌入更深等特点。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有助于更好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使外资企业从一般性市场参与者转化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建设者和受益者。

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稳的是外资基本盘，激活的是存量发展潜能，增强的是中国开放型经济韧性。要将外资境内再投资真正转化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关键在于围绕外资企业“投前有信心、投中有便利、投后有回报”的全过程需求，形成更加稳定、更有效率、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生态，从而增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布局中国、成长于中国的内生动力。

对此，一要提升全周期服务能力。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既要重视前期招商对接，也要重视企业落地后的持续服务，及时回应企业在扩大生产、技术改造、设立研发中心、布局区域总部等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对已有良好经营基础、再投资意愿较强的外资企业，应加强精准沟通和跟踪服务，推动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更好匹配。二要增强产业链配套和场景供给能力。各地应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围绕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绿色低碳等重点方向，提供更多产业协同、技术应用和市场拓展场景，使外资企业在融入中国产业升级进程中不断发掘增长空间，进一步增强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和意愿。三要强化稳定透明的制度预期。对跨国企业而言，再投资不仅取决于短期收益，更取决于对未来制度环境的判断。要持续提高政策连续性、规则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营造更加公平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使外资企业能够安心经营、持续布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重要着力点

崔卫杰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作出专章部署。自主开放既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也是适应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此背景下，扩大自主开放是最具主动性、可控性的开放发展策略，既能进一步彰显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也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十五五”及未来一段时期，需重点把握好以下几方面积极扩大自主开放。

第一，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

国际经贸规则正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延伸，不断触及如何维护公平竞争、如何实现有效监管等深层次开放问题。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更深层次开放，是从过去被动接轨向如今主动参与的跃升，是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必然要求。我国在制度型开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以来，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225项制度创新成果，通过试点上试验，带动全国制度型开放水平大幅提升。关税总水平已降到7.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大幅缩减，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从外资领域延伸到跨境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适应国际经贸规则新趋势为重点，推进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要结合自身实际，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全面参与绿色经贸、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新领域规则制定。可参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体系等，在放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便利获取金融服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领域积极开展探索与实践，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第二，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

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取消，扩大以服务业为重点的更宽领域开放是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必然选择。从国内外发展经验看，服务贸易增速明显快于货物贸易增速。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服务业开放作为支撑和保障。同时，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开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据测算，2015年至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平均在16%左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要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开展更宽领域的开放。要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业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升现代服务业开放水平。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推动重点服务领域加快开放，降低服务贸易限制水平。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提升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促进资金、数据、人才等高端要素跨境流动，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第三，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来看，我国形成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与以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为主的开放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这一阶段，是否处于沿海地区、是否有海运港口是影响开放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在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及数字经济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中西部等内陆地区曾经的区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为全国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造了良好条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作出部署，提出“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为新时代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要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为着力点开展更大范围开放。东部沿海地区要在开放政策制度试点、开放平台载体创新等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应结合各地工业化发展阶段及产业特色，聚焦服务、数字等相关要素资源创新制度设计，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

第四，创新开放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等开放平台，启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积极打造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两国双园”等形态多样的开放载体，既有效支撑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又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原创价值和贡献。与国际上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多以集散货物贸易相关要素资源为主不同，我国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等向集散服务贸易相关要素资源拓展，并通过复制推广突破了围网或区域范围的限制，探索将原本局限于园区的政策制度拓展到区外乃至全国的新路径新模式，适应了全球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为主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这是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开展更大力度开放的重要体现。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既要推动现有开放载体功能升级，又要谋划新的开放载体，以创新开放载体为支撑开展更大力度开放。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优化调整区域布局范围，鼓励首创新性、集成式探索，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有序推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取得良好成效，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深化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在服务领域准入准营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压力测试。聚焦打造开放高地，在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数字自贸试验区等探索基础上，着眼人才、数据、技术等高端要素资源集聚和高效配置，谋划和统筹推进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

第五，注重互利共赢。

主开放，不仅是为了自身发展，也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一方面，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世界共享中国市场大机遇。“十四五”时期，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超15万亿美元，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建交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另一方面，我国高水平开放为全球带来了实在好处。“十四五”时期，中国对外投资累计为东道国纳税3000多亿美元，带动了大量就业，促进了当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全球市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已成为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

未来，我国要进一步提升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包容性，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合作潜力大的经贸伙伴，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网络，进一步织密投资协定网络，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举措，灵活务实商签更多双边、小多边贸易投资协定。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